

我家有三个箱子：一个铁皮箱，墨绿色；一个纸皮箱，棕红色；一个小牛皮箱，橙黄色。都是父亲年轻时候买的，跟着他颠沛流离，一直到北平和平解放，到我们几个孩子长大。三个箱子，两大一小：铁皮箱和纸皮箱大，装衣服和被褥；小牛皮箱小，装我家的“金银细软”。所谓“金银细软”，不过是那个年代的粮票肉票布票等各种票证，还有户口本副食本，和父亲每月70元的工资。

1952年秋天，姐姐不到17岁，去内蒙古修包线铁路，没有想起要带两个大箱子中的一个，只是拖着行李卷，背着个背包，离开了家，离开了北京。

1967年冬天，弟弟刚满17岁，去青海油田，也没有打那两个大箱子的主意。父亲给了弟弟十元钱，让他到前门大街的竹木器商店，买回来一个竹箱，这是父亲早就“侦察”过的结果，父亲没有舍得腾出自己那两个大箱子中的一个，让弟弟装他新发的工作服和被褥。

1968年夏天，我21岁，去北大荒，父亲破例让我用那个铁皮箱装行李。但是，我还有那么多书，都是读中学时候节省下钱，一本一本买回来，燕子衔泥一般，好不容易积攒下的，想都带走。父亲看我摆弄着那些书，看出我的心思，腾出了那个纸皮箱，帮我把书一本一本装进去。我看出父亲犹豫之间的舍与不舍，第一次，感到对家里默默存放这么多年的箱子，存有的感情。

箱子的告别

肖复兴

这个外表裹着棕皮，涂了一层厚厚棕红色油漆的纸皮箱子，很结实，驮着满箱沉甸甸的书，到北大荒，竟然没坏。打开箱盖那一瞬间，同伴们十分惊讶，因为谁的箱子里也没有满满一箱子的书。由此，有人戏谑地给我起了外号“肖箱子”，取“潇湘子”谐音，拿我打谑。我心里明白，这是父亲对我的偏爱。家中的孩子，因为我的学习成绩最好，最爱看书。在父亲传统的观念里，还是根深蒂固觉得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。但是，那时候，我只顾自己的书，就那么理所当然地带走了两个大箱子，没有想到，父亲把家里的两个大箱子都给了我，家里的衣物该放在哪里？

流年似水。

1974年春天，我从北大荒调回北京当老师，又把那两个大箱子带了回来。铁皮箱，还是装衣服被褥等行李；纸皮箱，还是装着满满的。从北疆边陲那个叫福利屯的小火车站，箱子慢件托运，一路千里，沿途在佳木斯和哈尔滨转运，颠簸到北京，铁皮箱安然无恙，纸皮箱已经散了架。想它跟随父亲大半生，跟随我到北大荒六年，风雨兼程，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。

1978年，我考入大学，母亲住

姐姐家，我住校，家的屋子空了之后，借给一位年轻的朋友结婚暂住。屋子不大，年轻人比我讲究，嫌屋里的东西太多，过于拥挤杂乱，便把又破又旧的铁皮箱搬到屋外。四年后，大学毕业，我回家一看，铁皮箱不见了。那里装着的倒不是什么宝贝，却是我读中学和在北大荒写的几大本日记，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稿，写满厚厚一千多页稿纸，还有高中三年女朋友写给我的信，以及两地分居时我和妻子相互写的全部信件。我忙四下寻找，遍寻屋子的角落落落，都没有找到。最后，在院子一角发现，经过四年的风吹雨淋，铁皮已经沤烂，箱子里的纸页，成为一滩烂泥。那时候，我心里有些埋怨那位年轻的朋友。

几年之后，1984年，我搬家住进楼房，三个箱子，只有小牛皮箱还在，随之一起搬进楼房。以后几十年，陆续几次搬家，新东西不断增加，旧物不断遗弃，那个曾经装有我家庭生活乃至生命必需的小牛皮箱，不知什么时候不经意间丢掉了，失之交臂，竟然麻木得毫无知觉，连想不起来了。想想，那是父亲留下的最后一件宝贝，不是也被我弃之一旁了吗？自己都不曾珍惜，又怎么能怪朋友呢？埋怨那位年轻朋友时，曾想起过茨维塔耶娃的诗：“在我们之间还隔着一个自然段，整整一段。”其实，我和父亲之间，同样隔着一个自然段，也是整整一段。长长的一大段。

这个夏天太热了，安享空调的清凉，不读书，少写字，坐着躺着，无休止地刷手机。算着离小孙子出生的日子一天近一天，放开手脚疯玩吧，再努力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，就由着性子刷。

凡常的日子之外，我为什么还会想念一些不相

干的人呢？比如牟星，看了她的电视剧，忘不了剧中她和杨烁和翟小兴的恋爱梗，多好的女孩儿，温柔似水，深情有香，两个男人都配不上她。杨烁太老，翟小兴太丑，无论嫁给谁，都太亏了。真实生活中的牟星不温不火，她现在有男朋友吗？为什么我对她的牵挂如风如水，远远超过顶流的花旦们？再比如温太医张晓龙，个儿高但不帅，印象中还有点娘，我会上网搜他的消息，看到他极度低调地保护妻儿，就像看到了青山绵绵，泛动着人间的情与暖。“愿我如星君如月，夜夜流光相皎洁。”他用范成大的这句诗，表白自己的妻子，多年不变。我还喜欢辛芷蕾，她比牟星红，但不火。坦白地说，我喜欢她烈火般撩人的

性感，喜欢她花骨朵一样的红唇，喜欢她饰演的海棠朵朵，喜欢她敢爱敢恨、当断则断的爽利。当然，我偶尔也会关注高伟光和张彬彬，他们长得太帅了……

刷短视频有什么不好呢？一个人沉迷于流动的山水，沉浸于蓝天白云下

高高低低的雪山草原，沉浸于古镇、石巷、老宅院，孤身相对，坐拥、躺拥、独拥，万般自在、千种风情。不用花钱，也不用车马劳顿，给一个关键词，分分钟就能走进想要的诗与远方，想想就让人美得想哼歌儿。近日写稿子用到“审美力”一词，稍一关注，相关的视频便扑面而来，如同长藤结瓜，多是名校大教授结出的美学之“瓜”，品味之余，让人思路大开。且不用爬高上低翻书做笔记，还潮流，还时尚，还省力。

我喜欢种种思而不得，喜欢碧空尽之外的天际流，喜欢眼中那些此生此世无法用脚踩一踩的大路小路，喜欢用心触摸屏幕中的千门万户。何以消暑，刷视频啊，望洋兴叹，望美生凉，无限好。

邂逅管桦

谢俊美

在中学语文课上曾读到过作家管桦的《小英雄雨来》的故事，未曾想到大学二年级竟遇到他。1964年2月，南开大学学生去河北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3月南开历史系62届师生被分配到唐山市丰润县老庄子公社。我和我们班的四位同学被分配到王庄子大队，我的任务是当材料员。工作不久，县里又派来了一位干部，见了面才知道竟是作家管桦。

管先生是丰润县人，一直在北京居住，但是他坚持要求回乡体验生活，寻找素材创作。他当时四十多岁，身着一身黄呢军装，待人和蔼可亲，一点名作家的架子也没有。能和一个大作家一起学习工作，我感到很荣幸。不久就相稔熟悉了。他告诉我他不信管，姓鲍，从小跟随父亲投身革命。父亲在冀东抗日暴动中牺牲，他在部队里坚持学文化，写通讯报道。他给我讲了还乡河的典故。说当年北宋徽宗，钦宗被金兵押送途经一条河边，两帝叹息不知何时还乡，于是后人遂将此河称为还乡河。管先生还给我讲了日军一手制造的“丰润惨案”，屠杀我民众一千余人，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。

同年6月，我们南开学生返津继续学习。临行前，管先生特地为我写了一副条幅：“精神乃是战胜一切的动力”。我一直将管先生的赠言作为我的座右铭。

民生。天宁岛属于美属北马里亚纳群岛，土地面积100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两千。天宁岛机场在1945年有4条2590米长的平行跑道，可供B-29“超级堡垒”轰炸机起降，是美军在太平洋最大的机场。机场北面有两个凹槽遗迹，是为悬挂原子弹兴建的设施，原子弹的体积庞大，不能直接从地面装进B-29的弹舱，先在地上挖一个凹槽将原子弹放入口，再将飞机升上凹槽并对准弹舱，将原子弹装抬进飞机。我们摄制组在夏日的阳光下，实地探访和拍摄了这个凹槽。据了解，现在这个机场已经展开全面修缮，未来将重新作为军用机场启用。

那座无名小山

辛 渐

幢18层办公楼，位于钦州南路靠近桂林路。我们所在的出版社在十三楼。我那时刚研究生毕业，分配到出版社做编辑，编辑部所有的编辑都在一个大套间里集中办公。编辑部有几扇很大的落地玻璃窗，拉开窗帘，对面就是沪闵高架路，再望过去就可以看到一座小山。

这座无名小山是什么时候诞生的？几乎不得而知，也没有确切的记载。它的形成也许是比较意外的。这一带一开始是一片荒地，后来随城市的扩展，它的四周稍便利一点的地方开始造出了楼房。楼房逐渐合围，不知怎么的，有一处慢慢抬高，形成一座小山。这座小山并不太高，它的四周毫无遮挡，长满了树木，显得很有山势。它坐落在龙吴路、石龙路以及老沪闵路交叉的三角地带，没有一条路可以直通过去，周遭都是密布的树木和藤蔓，人迹罕至。它就在喧嚣的闹市一隅安静地立着，吞云吐月，与世无争。

我办公室的座位紧贴着窗户，有时伏案久了，就自然地站起来，转过身，背靠着办公桌向窗外望去，视线久久地落在这座小山上，对着它发呆，常常达半小时之久。山上丛生着马尾松、小樟树，各种杂木，还有不少毛竹，远望过去各种植物交织在一起，没有人工痕迹，完全是野生的，便多了份野趣。冬天有腊梅开着，夏秋有杜鹃花以及各种野花斗妍，秋天是飘红的枫叶，都很养眼。如果是雨天，整个小山会有淡雾笼罩，不时有缕缕白烟向四周飘逸。我有时看着看着，蓦然产生一种古意：“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。”

上海最大的山为佘山，其实也不大，一个时辰就可以逛完。有些公园比如长风公园内，也有山，但那个山比假山大不了多少。我出生在赣北山区，自小就在山上讨生活，砍柴，摘野果，还有放牛，对山的感情和依赖都很深。这座小山别人根本就不会关注，于我却有一种找到归宿的认同感，似乎在这座繁华的大都市中有了个可以倾诉的所在，能够天隔窗相望，寄托一种内心的情思。时间久了，也有爬上山去一探究竟的冲动，但不知如何，每次想要踏上小山，都没有成行。这反而让我对它的依恋更浓了。因此，当日常一个大套间所有的同事都下班离开了，我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倚在窗台上，默默看着这座无名的小山。我记得，很多寂寞的时光，很多愁绪，很多思考，都是在凝望着这座小山中度过的。

不过三四年后，这座小山被推平了，它的上面要建一座大型的城市交通枢纽。又过了一两年，一座大型的高铁车站上海南站如约而至，拔地而起。这座无名小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就这样消失了。一如世上的万事万物，不少都是在悄悄地生长，又悄悄地离去。我的记忆里，却一直保留着它的身影，日久弥新。



电视台拍摄

《焦土之上》(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)，我参加的是太平洋战争部分的外景摄制，5月分两个行程，先后到访太平洋中部的塞班岛、天宁岛和关岛，以及夏威夷的檀香山与美国本土的华盛顿与纽约。

珍珠港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总部所在地，就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，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袭珍珠港，掀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。已经退役的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就停泊在珍珠港，作为二战历史遗产供公众参观。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停泊的密苏里号就是盟军接受日本投降仪式的地点。

编者按：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，回顾和纪念抗战历史，不仅是对先烈的缅怀，也是对和平精神的传承。今天起，“十日谈”专栏将刊发十篇由抗战亲历者、抗战史专家、战时名人之后等作者撰写的文章。通过十个不同视角追忆抗战历史，追问历史真相。本组文章由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特约刊登。

1933年，父亲朱启平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医学预科，很快就投身于学生运动。他曾和燕大学联代表去包头宣传抗日、去绥远傅作义部参军、去泰山向冯玉祥将军请愿促其抗战。上山途中遭遇土匪打劫，父亲挺身而出，代表同学们和手持双枪的匪首谈判说情，说他们是一群抗日爱国的学生，宣传抗日。“盗亦有道”，匪首遂放行。

1939年父亲加入重庆《新蜀报》为编辑，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。他目击和报道了日军重庆大轰炸的暴行。次年他考入重庆《大公报》，做夜班编辑、外勤记者。抗战开始后，父亲曾以记者身份与美国新闻处交往，大力

檀香山与天宁岛纪行

何亮亮

5月7日我们摄制组一行到密苏里号参观拍摄，初夏的檀香山天气晴好。经过预约的游客甚多，大部分是美国人包括很多学生，也有一些日本人和中国人。密苏里号以实物、照片、甲板上的区块等重现了当年投降仪式的场景。盟军主要成员国都派高级将领或高官出席，主持仪式的是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麦克阿瑟上将。按照盟国英文名称的顺序，首先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是中国代表，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，他没有用美方提供的钢笔，而是用自己携带的毛笔，代表

向美国同行宣传中国抗日，与驻华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名记者白修德、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、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成了好友。白修德1946年出版了《中国的惊雷》一书，描述中国抗战的情况，其中大量引用了父亲提供给他的第一手资料，对西方世界了解抗战中的中国影响很大。

1944年盟军在太平洋战场战略反击，冲破日本国土防卫圈，父亲主动请缨前往太平洋战场采访，20天后抵关岛——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的前线指挥部所在。军方对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记者衣食住行极为优待，父亲是在美国海军部正式注册的随军记者，待遇同少校军阶，着军装，准配枪，战场上与普通士兵一样出生入死。父亲马不停蹄，一篇篇英文电讯、中文通讯，发往重庆。英文稿子照例送检，幽默的美军新闻检察官在窗口画了一副凶恶的面孔，两把剪刀代替了两只手，上面写了几个字：“我肯定扣留你那篇讨厌

中国写下了刚劲有力的名字。战败国日本派出的代表是外务大臣重光葵与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。在战舰甲板以白色画出的区域即当年投降仪式举行的地方，看到相关的照片，不能不对80年前的历史一幕感慨万千。抗日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，中国人应该永远记住这段历史。当年大公报记者朱启平在现场采访，他的特写《落日》记载目睹日本投降仪式。

在天宁岛我们参观和拍摄了军用机场。1945年8月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B29就是在这里装上原子弹，然后飞往日本，在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了原子弹，这两座城市几乎瞬间被夷为平地，数十万军

的稿子！”事实上检察官只把父亲的稿子更换了一个字，比原文更为贴切。抗战胜利后，父亲作为《大公报》驻美特派员，报道了联合国美、苏代表的辩论，《新华日报》全文转载。

此后父亲前往美军先已攻占的塞班岛、硫磺岛，其间亲身经历了状况空前惨烈的冲绳之役。父亲乘吉普车距最前哨百码处下车，一只脚还在车上，听到扑哧一声，转身伸手一摸，滚烫，巴掌大的尖利弹片实实在在地刚起身的座位上；再晚一秒弹片正好直穿胸膛。为了躲避战火，他躲到当地人石板下的地下墓穴里睡觉。六月间父亲登上第三舰队泰康提罗加号航空母舰，采访舰载军机对日作战实况，亲身登上鱼雷轰炸机坐舱枪射手位，寻觅敌潜艇，弹射起飞。空中惊魂三小时，收索降落，后面跟进降落的一架战机钢锁脱钩，轰然失事落海。他目睹许多飞行员，朝气蓬勃出击迎敌，返航归舰，多少架迷失，有去

无回。父亲在航空母舰上的通讯，《大公报》以“鹰扬大海”为专栏，于1945年7月20日起连载。

8月6日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，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投降。父亲随首批舰队进入东京湾。1945年9月2日，他登上密苏里号战列舰目睹日本投降仪式。各国记者中三名来自中国，均为燕京大学新闻系同窗：父亲和黎秀石均来自重庆《大公报》，另一位是中央社的曾恩波。父亲当晚在横须贺港中停泊的军舰上写下通讯《落日》。此后，这篇通讯被媒体纷纷转载，后来还收入中学语文课本。

1946年父亲同母亲新婚后，远赴纽约任《大公报》驻美特派员，母亲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硕士，仍与左翼朋友如龚普生、老舍、谢合庚、陈翰笙、爱泼斯坦等频频交往。两年之后他认定腐败的国民党大势已去，说服妈妈，做出了回国为新中国效力的决定。

回忆录
《我的1945》，全景式记录抗战胜利前后的社会生活巨变。
责编：刘芳 沈月明

十日谈